

## 卢梭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成富

为了纪念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诞辰三百周年，深刻认识他在社会、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全面梳理他的作品在中国乃至亚洲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南京大学法语系与巴黎第四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合作，于2012年6月6—8日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联合举办了“卢梭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法国、德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大的50余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研讨会就新的历史背景下卢梭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美学追求进行了新的诠释，对卢梭的政治观、文学观、人生观、自然观和宗教观等进行了全新的认识。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兼卢梭研究中心主任唐吉·拉米诺教授对卢梭在当代评论界的形象进行了综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二十世纪末卢梭研究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在法国，五十年代的卢梭研究主要以罗伯特·德哈代、让·斯塔罗宾斯基以及皮埃尔·布尔日林的重要研究作品以及七星诗社丛书出版的《卢梭全集》第一卷为代表，展现了一个新的卢梭，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卢梭形象。1962年，纪念卢梭诞辰250周年的庆典则迎来了更为开放的、同情的且复杂多样的研究方式。1978年，在纪念卢梭逝世200周年的活动中，有学者指责他推动了极权主义的发展，表达了一种厌恶女性以及憎恨个人的观念。唐吉·拉米诺教授的主旨报告客观公正，生动有趣，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卢梭在当代法国学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钱林森教授对卢梭在中国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中，卢梭无疑是个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以惊世骇俗的思想和文字而享誉世界，被后世作家尊奉为“暴风雨的前驱，新时代的导师”。就其文学地位而言，人们甚至认为，“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读者的是《社会契约论》（1898

年），其次是《爱弥儿》、《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新爱洛绮丝》。卢梭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为激进的人物，他的名字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时代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面旗帜，他们以卢梭为榜样，向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旧文化，进行坚决的斗争，迎来了中国新世纪、新文化的最初曙光；作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者，卢梭的名字曾吸引了“五·四”新文学作者，人们称他为“真理的战士，自然的骄子”，把他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加以亲近仿效；他作为敢于剖析自己、说真话的小说家曾对我国饱受四人帮极左思潮荼毒而仍不失良知的作家以新的思想启迪，推动他们反思自我，为振兴新时期中国文学，书写新篇章。总之，卢梭之东渡中国，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发展和现代化都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许钧教授从思想性和多元性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卢梭在中国译界的行旅历程：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法国文学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卢梭的作品则是其中研究和介绍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的时期，“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卢梭的作品也在这种目的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诠释与批评渐渐获得了充分的自主空间，卢梭也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

中国法国文学学会会长吴岳添研究员在其“纪念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报告中回顾道：“卢梭与伏尔泰都是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几乎所有的《法国文学史》中，伏尔泰由于当时在欧洲的影响最大，一向被视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与此相反，卢梭却被当做性格怪癖的孤独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始终是批评家们抨击的目标，关于他的《忏悔录》的争论更是从未停止过。”他指出，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分歧，虽然有着个人的因素，但根本上是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反映。他从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戏剧观念、文学作品、道德品质和身后影响等多方面对卢梭与伏尔泰进行比较，对两者的功过重新评价，认为“卢梭比伏尔泰更伟大。”

吴岳添得到发言及其与会学者探讨的兴趣。有学者认为，卢梭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其中《中国民约精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刘师培以中国思

想史上的“民约”说印证了卢梭学说，借此说服拒斥“民约”的顽老。当然，与其说刘师培以卢梭学说重新阐释中国的传统思想，倒不如说是以激进化的儒家思想重构了中国历史。在刘氏对“民约”阐释中，卢梭之“公意”实质上只是“民意”的代名词而已。通过反复强调君权源于“民意”，刘师培试图将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阐释为人民主动参与其中的“问政”。在重新阐释先贤政治思想的同时，刘师培为读者重构了不断崩溃的君主专权的历代图景，以此推翻君主制的合法性。

当然，作为“西学东渐”过程中最重要的思想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因此产生了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的卢梭研究。这一研究范式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有意无意误读的同时，也借卢梭学说对中国现实实践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灵感。有学者认为，马君武的《民约论》译本在某些核心概念及词汇的翻译与原文出入较大，译者对西方神学思想的某些词汇缺乏了解，因而夸大了共同体的力量，根本无法将卢梭原文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表达出来。其次，译文中不仅运用一些中国的旧观念来阐释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且隐匿的一些暴力、革命气氛也与卢梭原文基调不符。马君武的思想与卢梭之间有着天然的差异，译者所奉行的经世致用的道德观和卢梭所向往的德性世界不在用一个层面。作为率先将唯物论输入中国的思想家，马君武的思想与卢梭所秉承的宗教精神又有所不同。马君武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像德国那样现代民族国家，而卢梭希望的，是通过一个理念化的共同体来超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正确摆正对待西学的立场，正确处理好“遵循文本解释”与“创造性解释”以及“学术研究”与“思想创造”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卢梭研究空间，才能够也为转型中的中国现实社会提供新的理论参照。

卢梭有关自由、平等、人权、民意、教育、道德等方面的学说，尤其是他与中国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但探讨的话题远远不止这些。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卢梭专辟一节探讨了“文字”，明确提出文字令语言变质，正如社会令人类的天性变质一样，因为文字固化了活生生的话语，妨害了人类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1967年，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文字学》里高度赞颂了卢梭，把他视为从柏拉图到索绪尔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亦即语音

中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论语言的起源》的解读，德里达进行了深入的解构批评，从而阐明了自己的“文字学”，即“文字”并非西方传统认为的对语言的后来的外在模仿，而是刻在语言源头的差异性印记。

卢梭的思想是伟大的，精神是不灭的。作为最为激进的启蒙思想代表，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共同推动了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狂澜。然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较之伏尔泰等人，卢梭与法兰西精神气候更为契合。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充满了勇气和智慧，以及他的个人命运的戏剧性，所有这些正是法兰西民族精神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卢梭的文学气质和人文精神是最合适的推销模式，这种气质和精神时刻召唤着人们，郁达夫曾经说过，“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梭的著作只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